康熙诏准修建泸定铁索桥

李映发

泸定，在四川西部夹金山与大雪山之间的大渡河边，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城关所在地。城虽不大，但算得上四川西陲雪山中的一座闹市，这里是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居住着藏、汉、彝、羌等族人民。

今泸定城关一带，古代称为安乐坪，泸定桥修建后其街称为桥头乡。泸定之得名，乃为康熙皇帝（圣祖玄烨）所钦赐。

今泸定地面，元、明时属长河西等宣慰司（设在打箭炉——今康定）管辖。从内地到西藏，这里是要冲。嘉庆《四川通志》卷首十三载："自成都行七百余里至建昌道属化林营（设在化林坪，曾迁去打箭炉），化林所隶曰沈村、曰烹坝、曰子牛，皆泸河旧渡口，而入打箭炉"，"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因此，中央政府一直十分注意对这区域的管理和开发。

明末清初，这里土司叛乱，窃踞了广大地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化林营移往打箭炉，同时对交通要道进行整修，可是"不意炉番甚为狂悖，将修路之兵丁杀死，拆毁偏桥，阻截官兵"，并且"烹坝已被炉蛮侵占，辄取渡河，不但侵犯察道（今泸定县东北境），意在断我官兵归路"。（《清圣祖实录》卷二〇一、二〇二）土司叛乱，扰乱了社会秩序，防碍了藏汉各族人民的正常往来和商业贸易。康熙皇帝遣派理藩院侍郎满丕、四川提督唐希顺和参将李麟，兵分三路前往讨伐。康熙四十年叛乱被平定，喇叭番民等欢呼跪道附者一万二千余户（四十一年，为一万九千余户），赏给银牌（币），令其各安住牧。"（嘉庆《雅州府志》卷十《筹边》）翌年六月清政府添设安抚使五员、副安抚使二员、土百户四十五员，加强该地区的行政管理。长期的动乱局面结束了，藏汉各族人民的生活始得安定；川藏交通恢复，经济文化交流急待进一步发展；而泸河（大渡河）却横栏在交通要道上，解决它的阻隔，历史发展已成为必然。

古代内地进藏有三条路线：由青海西宁进藏；由打箭炉（康定）入藏；从今云南中甸等地去藏。朝廷命使往来和官方贸易多走北边路线。明朝永乐五年至十二年，藏汉人民共同修建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路，明朝政府设置了驿站，"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明史》卷三三一）。随着四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川藏联系的加强，西藏的氆氇、红花、藏香、皮毛、药材大宗销进四川等地，而西藏也更加依赖四川的茶叶、成都机户织造的"哈达"（参见乾隆《雅州府志》卷七《茶政》、陈克绳《西藏遗闻·风俗》）等货物，打箭炉成为藏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交往和贸易最重要最热闹的场所。由成都、经康定（打箭炉）入藏的路线日益显得重要。

由川进藏，大渡河原有三处渡口：沈村、烹坝和子牛。由于河深水急，乱石突兀，木船无法过渡。行人过河，是乘坐在一个竹篓里，竹篓挂在连接两岸的大绳索上的滑筒中，小绳牵引而滑向对岸。这种过渡方法，今天在四川甘孜、阿坝两州的崇山峻岭中还能见着。这种渡河方法，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援索悬渡，险莫甚焉！"这种交通工具，不适应于政

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康熙皇帝批准了四川巡抚能泰和提臣岳升龙的建议，在距化林坪八十余里的一个较平坦的安乐坪处修建一座铁索桥。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六月，泸定铁索桥建成。康熙皇帝不仅在建桥时“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诏从所请”，而且桥建成后，命令派兵防守，还对工程过细探问，谕大学士等曰：“往达赖喇嘛地方，途中铁索桥甚多，然此处之桥，与云南铁索桥不同。云南地方，于两石贯铁索建桥，极其坚固，今安乐地方，立石柱贯铁索为桥，久之恐未必坚固耳。”（《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五）他再三叮嘱巡抚能泰，要注意铁索桥的牢固性。康熙皇帝为这一大工程的竣工感到高兴，作了御制文《泸 定 桥 碑 记》。他在《碑记》中指出修建这座桥的重要意义，“凡命使之来往，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所以“深惬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三十三《宸章》）对修桥有功的诸臣将士，朝廷都给予嘉赏或晋升。

《清圣祖实录》和地方志中记载，泸定铁索桥“东西长三十一丈，宽九尺，施索九条，覆板木于上，而翼以扶拦，镇以梁柱，皆熔铁庀事。”铁索桥竣工后，于东岸桥楼处树立康熙御制碑一座。桥东头还立有铁铸水牛和独角兽，桥西头有铁铸蜈蚣，以示永远镇水。

我国西南边疆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中，有各式各样的索桥，乃为世界桥梁架设史上的奇观。泸定铁索桥具有典型意义，故赢得不少游人的赞赏和墨客的咏叹。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去西藏来到这里，记述说：“其桥中央低而两头昂，如张匹练，行人凌风跨板而过，左右动摇，不觉腾身云雾中，两耳涛声轰激，心神震悚。”他还记述，“午前则满铺板，午后风起减板一半，状若窗棂，以通风气。”（《西藏日记》民国廿六年二月《边疆丛书》）泸定午后起风，至今如此。桥长铁索重，故“中央低而两头昂”；铺满板受风面积大，有损于桥的保护，故“风起减板”。现在铁链和桥头梁柱更加牢固，每块木块间留有一定缝隙，可透风气，每天午后不再撤减铺板了。

雍正时，四川提督岳钟琪有诗咏泸定桥云：“泸水环遐域，天然界汉羌；通津横铁锁，扼险壮金汤；影落鱼潜遁，虹悬鸟避翔。丰碑留御笔，千古镇蛮荒。”其诗指出了泸定桥在川康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意义。

查礼有诗云：“蜀境多尚竹索桥，松、维、茂、保跨江饶。几年频陟竟忘险，微躯一任轻风飘。斯桥熔铁作坚炼，一十三条系两岸；巨木盘根系铁重，桥亭对峙高云汉。左治犀牛又蜈蚣，怪物镇水骇龙宫；洪涛奔浪走其下，迢迢波际飞长虹。碑石穹窿辉宸翰，辉煌金碧岩间灿。白马青牛日往来，低头不敢闻瞻玩。规模宏壮足大观，层层栋柱围雕栏。驿传内外乌斯藏，去回无复违惊湍。……”查礼在泸定地区“几年频陟”，因而他的诗描写得全面、翔实，使读者能获得对泸定桥的设置和气势的全面认识。（均见《四川通志》卷三十二）

关于此桥工程的架设，姚莹《康辅纪行》载，当地人有个传说：康熙时修建此桥，先系铁索于东岸，然后用小舟载索渡河去西岸，因索重水险，小舟覆没，连试几次都未成功。架桥遇到了困难，正在危难之际，“一番僧”翩然而来，给大家出了个主意，教以先用竹索系在两岸，竹索上串数十个大竹筒，再将铁索穿入竹筒，用一根比桥长的绳子缚筒，对岸人牵绳引筒，竹筒到达，铁索也随之抵达彼岸。采用“番僧”建议，工程顺利进行，完成了十三根铁索的架设。这传说是否可据，姑具不论，但它反映出泸定桥的架设是藏汉各族人民的心愿，并为它的建造贡献出了智慧和力量。

大渡河、泸定桥，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边隅隘州”（《雅州府志》）。桥修完后，康熙皇帝数谕“移兵防守”，并要求地方官和当地民人“岁时缮修，协力维护”，“永保勿

坏，以为斯民贻无穷之利。”（《泸定桥碑记》）此时，将化林营移驻沈村防守，千总一员，兵一百名。嘉庆时，在定泸设有把总一员，骑兵和步兵三十六名，属于阜和协（驻打箭炉）管辖。道光年间，泸定桥东岸居民已有百余户，设立一巡检、一千总，管桥治地。

泸定桥的修建，这条进藏的交通线更为重要了，加强了四川与西藏的联系，加强了清廷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理。清代泸定地面为冷边、沈边、咱里三土司部落，清廷驻军予以分别管辖，至清季未发生过大的叛乱。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总督赵尔丰从昌都地区整饰边务返川经过此地，依照民政部奏案进行改土归流，收缴了三土司的印信。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尚未完成，清朝便垮了台（参见民国《川边财政厅泸定县调查表》）。

清康熙时，“泸定”一词，专指其桥。民国以后，“泸定”一词指的是县或城关（桥头乡），而其桥则称之为“泸定桥”或“泸定铁索桥”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泸定桥长一百米，宽二点八米，十三根铁链锚固于两岸，其中九条并列，上铺木板，供人马通行，另四条作左右扶拦。每根铁索有碗口粗，数吨重。当然，今天所见的十三根铁索不一定是康熙年间的，因为二百多年来培修过数次。解放初，在泸定桥西，大渡河上游三、四里处修建了一座钢架公路桥，川藏公路由此通过。虽然有了新修的公路桥，但铁索桥仍然负担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来来往往。面对着“雪浪滔天大渡河”，峻岭深谷悬空摇荡的十三根铁链，追溯它两百多年来在民族团结，开发和巩固边疆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不说清圣祖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粗长笨重的铁链，能在这边陲之地冶练铸造，架设成桥，康熙中期四川经济力量和工程技术也可以窥见一斑。

《清代人物传稿》选载

德　格　类

杨余练

德格类，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出生在群山环抱的明建州左卫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乡），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子，正蓝旗人，封爵和硕贝勒，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1635年11月11日）去世。他是满族（女真）入关前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德格类从小生活在女真族堀起，后金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战火硝烟中，成年后即随父兄征战，授为台吉（蒙语，贵族称号）；而作为一名青年将领崭露头角，则是始于天命六年（1621年）的辽阳沈阳之役。天命四年（1619年）的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击败了辽东的明军主力，攻占了开原和铁岭；一年多后，又为争夺辽沈地区而大举兴兵。天命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劲旅，按左右翼分八路略奉集堡，揭开了辽阳沈阳之役的序幕。奉集堡在沈阳东南四十里，是居沈阳和辽阳之间的军事要地。努尔哈赤进驻城北高岗，就近察看明军的部署和实力，坐镇指挥。驻守奉集堡的明总兵李秉诚，率三千骑出城六里扎营，遣二百骑为前探，与后金八旗左翼接战，败退。日午，德格类随右翼会努尔哈赤于高岗，正准备收营时，得报明军约二百骑就在附近。努尔哈赤命右翼军搜击，明军二百骑溃逃。德格类